



20_{世纪}
中国学术文存

主编/陈平原

A Collection
of the Research Papers
in the 20th Century
of China

湖北教育出版社

汤一介 胡仲平/编

魏晋玄学研究

20_{世纪}
中国学术文存

主编/陈平原

A Collection
of the Research Papers
in the 20th Century
of China

汤一介 胡仲平/编

魏晋玄学研究

湖北教育出版社

(鄂)新登字 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玄学研究/汤一介,胡仲平编.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8.8

(20世纪中国学术文存)

ISBN 978-7-5351-5118-6

I. 比… II. ①汤…②胡… III. 玄学-研究-中国-魏晋南北朝时代 IV. B235.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4660 号

出版 发行:湖北教育出版社
网址:<http://www.hbedup.com>

武汉市青年路 277 号
邮编:430015 电话:027-83619605
邮购电话:027-83669149

经 销:新 华 书 店
印 刷:武汉中远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850mm×1168mm 1/32
版 次:2008年8月第1版
字 数:501千字

(430034·武汉市硚口区区长丰大道特6号)
1 插页 20.5 印张
200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 000

ISBN 978-7-5351-5118-6

定价:38.00 元

如印刷、装订影响阅读,承印厂为你调换

总 序

陈平原

给 20 世纪中国学术做总结,此举曾被毫不犹豫地断为“狂妄”(因当初对此项工作感兴趣者,多非博学鸿儒);没想到风云变幻,才几年时间,“学术史”竟成了时尚话题。于是,又有高人出面冷嘲热讽——都什么时代了,还在摆弄那些“老古董”。如此一波三折,宏图尚未真正展开,已被中国学界“消费”得差不多了。其实,学术史研究之回首往事,既倍感痛苦,又进展缓慢,吃力不讨好,难怪其“风声大,雨点小”。对于踌躇满志、正忙着“与国际接轨”的中国学界来说,最响亮的口号,依然是“拿来主义”。

日本学者竹内好在《鲁迅》一书中,对鲁迅“不退却,也不追随”的性格,有如下描述:“他让自己与新时代论辩,由于‘挣扎’而清洗自己,再把清洗后的自己从中脱出身来。”这种夹带着血与泪的“挣扎”,不同于世人之动辄“幡然悔悟”,因其有切肤之痛,步子可能迈得更坚实些。如果不避拉大旗做虎皮之讥,我愿意将此思路移用于今日之学术史研究。表面上属于退一步进两步的策略性选择,而我更看好的,却是其中的自我反省意识。外行只见其指点江山,似乎痛快淋漓;身处其中者,则不无鲁迅“抉心自食”的意味。所谓自省,既针对整个学界,更针对学者本人,这也是我再三说的,对有志于治学术史的人来说,“过程”可能远比“结果”重要。

以“文存”而不是“通史”的方式立说,有便利读者的考虑,但更重要的,还是挑战目前中国学界普遍存在的“好大喜功”、“华而不实”。话越来越多,书越写越厚,可见识却越来越少。与其写一部屡经稀释的百八十万字的“通史”,不如老老实实,讲完自家的点滴体会,引领读者进入某一已相当充盈的“学术角”。这里奉献的每册图书,均包含学术史性质的“导论”、群星闪烁的“文选”,以及相关论著的“索引”三部分。“导论”见史识,“索引”显功夫,“文选”部分则在对先贤表达敬意的同时,为后来者提供阅读及研究的方便。

“导论”的责任,主要不是表彰优秀论文,而是准确勾勒本专题在20世纪中国的兴衰起伏,因而,更像是一部采取特定视角的具体而微的学术史。如此定位,要求研究者不仅有历史感,更应具前瞻性。说到底,论者透视历史的深度,与其展望未来的能力成正比。学术史研究中必不可少的“问题意识”,决定了本丛书的工作目标:既须“史”的深厚,又兼有“论”的新锐。

至于选题的原则,暂时局限在“人文学”,尤其是其中的“中国研究”。所选专题,要求以往的研究成绩显著,思路清晰,而且至今仍能吸引学界的目光。落实到具体操作层面,选题最好是不大不小,不新不旧——太小学术容量有限,太大则无从把握;太旧不能吸引今人目光,太新则没有历史积累。

以“选本”带“综述”的形式,总结20世纪中国学术进程的某一侧面,乃本丛书的基本框架。这么一来,“导论”、“文选”、“索引”三者,呈鼎立之势,互相呼应,缺一不可。相对来说,前后二者定位明确,不会有太大的争议;反而是中间部分难以处理。在同一专题成千上万的论著中,选择最具代表性的寥寥数十则,实非易事;更何况,这些选文除本身的学术价值外,还必须能大略显示学问推进的轨迹。百年文章,本就迭有变迁,再加上选录范围涵盖大陆、台湾和港澳的原创之作,如此体式纷纭,若强求一律,必定伤筋动骨。故对所收各文,除进行必要的版式统一(如简体横排、篇末注等)之外,其

他则尽量尊重原文保持原貌,这样既反映了学术史的真实,也能给读者以一定的历史感。

本丛书之兼及“史家眼光”与“选本文化”,要求编纂者将巨大的信息量、准确的历史描述,以及特立独行的学术判断,三者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这样的工作,虽不属如今大受推崇的“个人专著”,但借此勾勒出20世纪中国学术史的若干面影,并给后来者的入门提供绝大方便,在我看来,“功莫大焉”。

2001年11月17日于京北西三旗

总序/陈平原	1
在西方学术背景下的魏晋玄学研究/汤一介 胡仲平	1
五朝学/章太炎	52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九月间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讲/鲁迅	58
论古今学风变迁与政俗之关系/刘师培	72
谈郭象注(答友人)/熊十力	79
魏晋清谈及其影响(节选)/杜国庠	82
记郭象的自然主义/胡适	86
言意之辨/汤用彤	88
玄学的方法/冯友兰	107
魏晋玄学与南渡清谈/钱穆	114
阮籍、嵇康的思想/容肇祖	122
论《世说新语》和晋人的美/宗白华	141
清谈思想初论(节选)/贺昌群	158
魏晋思想之历史背景与阶级根源/侯外庐	167
魏晋玄学与山水画的兴起/徐复观	190
魏晋学术思想界的新倾向(节选)/刘大杰	210
魏晋玄学的评价问题/张岱年	218

魏晋玄学与名理/唐君毅	222
王弼玄理之易学(节选)/牟宗三	233
清谈与清议/唐长孺	241
魏晋玄学研究中的两个问题/王明	249
名教自然“将无同”思想之演变/周一良	253
佛学的玄学化/冯契	260
论魏晋时代佛学和玄学的异同/石峻 方立天	273
从王韩玄学到程朱理学/朱伯崑	293
略论杨泉/萧蓬父	310
论从魏晋玄学到唐初重玄学/汤一介	325
名教与自然之辨的辩证进展/庞朴	345
魏晋风度/李泽厚	370
魏晋玄学与儒道会通/余敦康	389
《魏晋玄谈》前言/孔繁	405
老庄、郭象与禅宗	
——禅道哲理联贯性的诠释学试探(节选)/傅伟勋	411
玄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楼宇烈	431
略谈魏晋玄学的自然主义思想/许抗生	444
论郭象的“玄冥之境”	
——一种心灵境界/蒙培元	460
对《列子》的再考辨与再评价/牟钟鉴	475
关于魏晋的“言意之辨”和文学理论/刘文英	490
嵇康与玄学“三理”/陈战国	498
向秀玄学思想简论/李中华	520
两汉儒学与魏晋玄学衔接的重要人物	
——何晏(节选)/那薇	532
《谷梁传疏》所引王弼《周易大演论》佚文考释/王葆玟	542

郭象哲学及其在魏晋玄学中的地位/陈来·····	554
论魏晋价值观的重建/杨国荣·····	575
张湛思想发微/马良怀·····	588
汉魏佛教与何晏早期玄学/王晓毅·····	606
20 世纪魏晋玄学研究主要论著目录索引 ·····	615
后记·····	643

在西方学术背景下的魏晋玄学研究

汤一介 胡仲平

“清谈误国”是自两晋当朝以至 20 世纪前中国历史上大多史家与学者对魏晋玄学的总体评价。随着历史进入 20 世纪,随着中国学者对西方文化了解的深入,受西方文化学术的影响和启发,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和评价魏晋玄学。由晚清、民国以及建国后数代学人的共同努力,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玄学同周秦诸子、两汉经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以及清代学术一道,成为中华民族学术、思想、文化发展史上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获得了全新的肯定和评价。我们根据 20 世纪魏晋玄学研究在各个不同的时间阶段上所呈现出来的受到西方哲学思想影响的特点,以及这种研究同中国现实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之间的相互关联影响,将魏晋玄学的研究大致分为五个阶段予以评述,以求得对于 20 世纪魏晋玄学的研究有一总体把握。

一、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

正如侯外庐在其《中国思想通史》中所指出的那样:清以前各家对清谈的评价,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多不究其学术内容,而将之于所谓内乱外患相系在一起,以明因果。这个弱点,到了清代汉学家,便

起了反动,多为魏晋学者辩诬。^①这种为魏晋学者辩诬的新的倾向得到愈来愈强烈的呼应与支持,直至历史进入清末民初的20世纪。

刘师培于1907年撰《论古今学风变迁与政俗之关系》一文,在指呈诸多史家与学者,包括明末清初的顾炎武(亭林),对魏晋六朝之学的否定性评价之后,指出他们皆:“不知两晋六朝之学不滞于拘墟,宅心高远,崇尚自然,独标远致,学贵自得,此其证矣。故一时学士大夫,其自视既高,超然有出尘之想,不为浮荣所束,不为尘网所纓,由放旷而为高尚,由厌世而为乐天。朝士既倡其风,民间浸成俗尚,虽曰无益于治国,然学风之善,犹有数端,何则?以高隐为贵,则躁进之风衰,以相忘为高,则猜忌之心泯,以清言相尚,则尘俗之念不生,以游览歌咏相矜,则贪残之风自革。故托身虽鄙,立志则高。被以一言,则魏晋六朝之学,不域于卑近者也,魏晋六朝之臣,不染于污时者也。”^②同历史上范宁诸人目王何为桀纣、顾亭林以王何嵇阮诸人为罪人的批评迥然相异,刘师培肯定了魏晋六朝时期的士格之高、学风之善,他认为汉魏之际家国的倾覆、俗尚的衰败,政治家的政治行为应负主要的责任,而文人学士放旷的作派、厌世的态度不过是为了避祸(“远害”)而不是为了趋利,他们的态度和行为尽管对国家的治理没有直接的益处,然而他们宅心高远、崇尚自然的作风与品格对峻严的政风、贪鄙的俗尚则多少具有正面的示范效用。

紧接刘师培之后,章太炎于1910年撰《五朝学》一文,同刘氏一样,章氏亦就历史上学风之得失进行比较,批评了历史上的史家与学人认为魏晋之俗衰敝愈于前朝的成见,指出:“夫驰说者,不务综终始,苟以玄学为诟,其惟大雅,推见至隐,知风之自。玄学者,因不与艺术文行牾,且翼扶之。……夫经莫穹乎《礼》、《乐》,政莫要乎律令,技莫微乎算术,形莫急乎药石,五朝诸名士皆综之。其言循虚,其艺控实,故可贵也。……五朝有玄学,知与恬交相养,而和理出其性。故骄淫息乎上,躁竞弭乎下。……世人见五朝在帝位日浅,国又削弱,因遗其学术行义弗道。五朝所以不竞,由任世贵,又以言貌

举人,不在玄学。”^③同刘氏行文方式上有所不同,章氏多称引史实以为佐证,得出如下几点较为信实的结论:一是魏晋之俗并不比汉俗更为衰敝;二是五朝名士多具有某一方面的特长与技艺,“其言循虚,其艺控实”;三是玄学讲究恬淡养性,故对社会上层的骄淫、社会下层的躁竞具有平抑作用;四是五朝的国祚短浅、国力衰弱不能归咎于玄学,而在于政治上选拔和任用官员的方式不当。值得注意的是章氏提到:“凡为玄学,必要之以名,格之以分,而六艺方技者,亦要之以名,格之以分。治算,审形,度声则然矣。服有衰次,刑有加减。《传》曰:‘刑名从商,文名从礼。’故玄学常与礼律相扶。自唐以降,玄学绝,六艺方技亦衰。”^④这表明章氏隐约认识到玄学家们讲究名理性分的思维方法有助于发展学术、掌握技艺、维护礼律。

章太炎、刘师培几乎完全是在中国传统学术的基础上,从史学、文学的角度对魏晋六朝之学作出了具有翻案性质的肯定评价。随着历史由清朝进入民国,做过章太炎的学生,并同刘师培一样在北京大学讲授过“中国中古文学史”课程的鲁迅于1927年发表了著名演讲《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⑤。这篇情辞并茂,亦庄亦谐的精彩演讲,既生动又深刻地揭示了由汉末至东晋时期中国文学(主要是诗文)风格的演变与政治和社会环境变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从题面上看,以及从演讲的篇幅上看,鲁迅似乎主要在谈魏晋时期一班名士喜服药、好饮酒的生活方式与他们的生活态度、文章风格之间的紧密联系,这当然是有一定的联系,但是更为重要的是鲁迅在这篇并不算长的演讲中准确地把握了魏晋时期诗文的风格特点,并深刻地揭示出这些特点的形成与急剧变化着的社会政治环境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得出完全超脱于政治、超脱于社会(人世间)的诗文的结论。

例如鲁迅指出由于曹操“尚刑名”、“尚通脱”的政治特色,从而使汉末魏初的文章是“清峻”、“通脱”;又由于孝文帝曹丕在《典论》中主张“诗赋欲丽”、“文以气为主”,于是汉末魏初的文章于清

峻、通脱外,又加上“华丽”与“壮大”。而这种带有悲凉、激昂和慷慨,即“以气为主”的壮大,是与当时的主要文人们(如建安七子)生于乱世,亲戚朋友死于乱者特多的现实生活分不开的。又如鲁迅认为魏末晋初的文章特色是“师心”和“使气”^⑥,而这种风格的形成亦来自于现实政治的刺激。如司马氏提倡孝治天下,而实际上干着谋权篡位的勾当,而嵇康、阮籍讲“非汤武而薄周孔”、“越名教而任自然”,表面上非毁礼教,实际上倒是承认礼教,并且相信礼教到固执之极,由于嵇阮们内心的真实感受与他们不屑与伪礼教者为伍所表现出非毁礼教的言行之间的强烈冲突,因而形成了他们“师心”、“使气”的诗文风格。再如鲁迅认为到了东晋,一方面各处都夹入了佛教的思想,另一方面更因为“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的风格便趋于“平和”,其代表人物便是陶潜(渊明),但即便如此,“诗文也是人事”,超脱如陶渊明也不能完全忘情于世事和朝政。

鲁迅这篇关于中古文学史的学术演讲之所以被人们广为传诵并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一方面固然是由于它对魏晋时期的文学风格和特征作了准确的把握和生动的描述,并且对造成这种文学风格和特征的社会政治背景和各位作者的个人作风、生活态度作了深入的分析 and 合理的揣测,因而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已成为中国文学史研究的典范;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它发表于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革命处于危急的关头,而演讲的地点又是在曾经是刚过去的革命高潮的中心而现在正处于白色恐怖之中的广州,因而这篇饱含着演讲者对现实生活的沉痛感受的演讲,也必然充满着对同样受着黑暗的社会政治现实压迫的魏晋士人的同情,并且这篇演讲还不失时机、语含机锋地对黑暗的社会现实进行了讽刺和揭露,具有鲜明的战斗风格,故极易引起人们的共鸣,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文学史研究的范围。

鲁迅同章太炎、刘师培都是生于“乱世”和“末世”,作为敏感的学者和文人,他们都对苦难的现实社会怀有强烈的不满因而趋向革

命,他们的学术多少都同革命联系在一起,如鲁迅就视他的老师章太炎为“有学问的革命家”(《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并视刘师培作为主要撰稿人之一的《国粹学报》为“谈学术而兼涉革命”^①的刊物;作为被毛泽东誉为“伟大的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的鲁迅更是具有战斗的革命精神。由于他们对现实怀有强烈的不满,因而他们极易对同样处于“乱世”和“末世”的魏晋士人产生“同情的了解”;又由于他们倾向革命,因而在对魏晋时期的历史和文学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更易于做出翻案的文章。或许是由于他们的“革命性”,多少也会削弱或限制他们的“学术性”,例如鲁迅在演讲中谈到何晏是吃药的祖师,并认为王(弼)何(晏)是会做文章的名士,但他对王何等“正始名士”的文章风格未置一辞,更没有对王何诸人的学术贡献作出评价。当然,这更可能是由于鲁迅主要是从文学的视角来看待魏晋的文章,而王何的文章又没有那么鲜明的文学性的缘故。

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真正关注魏晋名士的思想或哲学贡献的学者有冯友兰和容肇祖。容肇祖于1925、1926年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想写一部“魏晋思想史”,为此作了大量笔记,后整理发表为《述何晏王弼的思想》(1927年)、《述阮籍嵇康的思想》(1928年)^②。其时胡适已经在北京大学讲授“中国哲学史”课程,其成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年)已经发表,无疑容肇祖对王何嵇阮思想的评述是受到胡适的学术范式的影响,如容肇祖在评述王弼的天道观念时所提及的汉末“道士《易》”一名便出自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他并且在文章中特地指明这一点^③;又如容肇祖所关注的“自然主义”的观念,便是胡适评价自老子以还的中国道家思想的中心概念之一,直到胡适的晚年,他所关注的郭象注《庄子》的思想仍是“自然主义”^④。更重要的是容肇祖对王何嵇阮的评述不仅受到胡适的直接影响,而且是通过胡适而间接受到了西方学术的多方面影响,如他用自然主义的天道论、政治论、人生观的概念对王弼的学说进行系统的疏理,他用心理学的概念来解释王弼的关于“情”的论述,他

用逻辑学的矛盾律、不容中律(即排中律)来分析嵇康的名学,在在都体现出西方学术观念不仅仅影响到在西方接受完整教育的留学生,而且已经通过这些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影响到在中国的课堂上接受教育的大学生,他们开始很自然地用西方学术观念来重新审视中国的传统思想和建构中国的现代学术。

当代学者余英时曾借用美国的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S. Kuhn)在其名著《科学革命的结构》中所提出的科学革命的理论以及“典范”或曰“范式”(Paradigm)的概念来解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在中国近代史学革命上的中心意义。按照余英时所概括的,所谓“典范”的建立,有广狭两义,前者涉及全套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的改变,后者指具体的研究成果发挥示范作用,既开启新的治学门径,又留下许多亟待解决的新问题。依照库恩的思路,科学进步的图景可以描述为:典范的建立——常态研究的展开——严重危机的出现——调整适应中寻求突破,并导致新典范。如何在传统与变革之间维持“必要的张力”,乃是成熟学者所必备的素质,而对于史家来说,最为关注的很可能是危机已被意识、新典范即将出现的“关键时刻”。依余英时之见,清代三百年的考证学到了“五四”前夕恰好碰到了“革命”的关头,而《中国哲学史大纲》又恰好提供了“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故理所当然地成为新典范的代表^①。关于胡著《中国哲学史大纲》是否是“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研究公认的典范是有争议的,有人认为后来的学术发展史表明冯友兰的两卷本《中国哲学史》才是20世纪中国学术界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典范”之作^②。不管是胡著还是冯著的中国哲学史哪一部更为典范,胡适应该算是以现代的学术眼光撰写“中国哲学史”的第一人,冯友兰亦认为《中国哲学史大纲》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书。”^③因此,胡适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学术影响是非常大的,其典范作用可以从他对容肇祖的学术影响上看起来。

如果说容肇祖对王何嵇阮思想的疏理是通过胡适间接地受到

西方学术观念的影响的话,那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冯友兰则是直接地利用西方哲学史上的观念和学说来比较和解释郭象的哲学,他同样发表于1927年的《郭象的哲学》是借助于西方学术的观念构筑了一个中国古代哲学家的“很好的哲学系统”(冯友兰语)。首先,该文不同意许多人认为中国哲学无进步的观点,而认为中国哲学在表面上看都是后人在不断地讲前人的思想,而实质上每人的讲解都有引申发挥,这便是进步,如郭象的《庄子注》便是郭象的哲学。为了阐释这一观点,冯友兰引用了亚力士多德关于潜能(Potentiality)与现实(Actuality)的说法,以表明事物由简趋繁,学问由不明晰进于明晰的学术进步史观。他认为郭象不但能引申发挥庄子的思想,而且能用抽象、普通的理论说出庄子文章中所包含的意思,有新的见解。其次,该文认为郭象关于“独化”的学说与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Parmenides)很相似。因为老庄所谓的“道”并不是个数学上的零,而郭象则说道就是个零,万物之所以如此如此,只是因为它们自然地这般这般。郭象《知北游》“无古无今,无始无终”注云:“非唯无不得化为有也,有亦不得化为无矣。是有之为物,虽千变万化,而不得一为无也。不得一为无,自古无未有之时而常存也。”这段注文表明一方面郭象将道归为零;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有”虽千变万化而不能变成无,它是永恒存在的。这确实类似于古希腊爱利亚学派的创始人巴门尼德关于“存在”的思想,巴氏认为“存在者存在”,存在是永恒的,不生不死的;存在是一,是连续的、不可分的等等。再次,该文认为郭象关于宇宙是常变的思想又好象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关于“一切皆流”的思想。最后,该文认为郭象的哲学同斯宾诺莎(Spinoza)的《伦理学》一样,是实在主义与神秘主义的合一;并且认为郭象的形上学是实在论,而其所论之玄同无分别则是认识论,因此郭象这一类的道家哲学,虽有神秘主义,然与科学并不冲突。冯友兰对郭象哲学的研究和叙述清楚表明他在努力用西方哲学的概念思考和解读郭象的哲学。

从以上我们对 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有关魏晋时期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状况的概述和分析,我们可以感受到这一时期的中国学术正在经历着重大的变化。这是一个过渡的时期,一方面是晚清一代的学者,象章太炎、刘师培,他们承继着清代汉学家,如朱彝尊《王弼论》、钱大昕《何晏论》的学术观点,从史学研究的角度为魏晋学者辩诬,由于他们同魏晋时期的学人与文士一样身逢“乱世”和“末世”,因此他们对魏晋时期的文人和学士又多了一份同情和理解,他们充满感情、带有革命意识的翻案文章容易引起人们对魏晋六朝之学的广泛关注,不过由于学术视野的局限,他们对魏晋六朝之学在思想、哲学方面的意义和价值并没有深入的阐发。另一方面是民国初期的学者如胡适、冯友兰,他们大都具有到西方留学的学术背景,开始用西方的学术观点重新审视和评价中国古代的思想、学说,他们中的少部分人开始关注魏晋时期重要学者王何嵇阮以及郭象的思想、哲学,这预示着对于魏晋时期学术思想的研究将有重大的突破。但由于这不过是中国现代学术的草创阶段,因而这段时期的研究带有较多的比附的痕迹,因此新的突破需要假以时日,需要众多不同学科的学者共同参与与努力。

二、20 世纪三四十年代

中国现代学术意义上的魏晋玄学研究开始于这一时期。其时中国正国难当头,中华民族正处于生死存亡之秋,然而同危难的时局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优秀的知识分子正在紧迫而从容地进行着中国文化的研究和建设。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一个从哲学、史学、文学、美学等不同的学科领域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化学术展开研究和讨论的学者群体,在他们中有哲学史家汤用彤、冯友兰,史学家陈寅恪、钱穆,思想史家容肇祖、贺昌群、刘大杰,美学家朱光潜、宗白华等人。而其中汤用彤因其对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借